

坎坷復國路—從《清華簡·繫年》與《左傳》 重探失落的春秋衛國史實

李怡嚴*

摘要

《清華簡·繫年》可能是一部楚國編的歷史教科書。其中第四章簡介衛國的歷史，其重點在衛幾亡於赤狄，與衛文公在漕復國，其後又東遷楚丘，至成公時，又東遷帝丘。與《左傳》比較，《繫年》太簡且有錯誤，尤其將衛文公誤為「公子啟方」。我利用這個誤載，推測「公子啟方」可能是《左傳·閔公二年》的「齊子」，他是衛文公的弟弟，在衛文公即位後仕齊為齊桓公的大夫。此人在戰國諸子的議論中，又受到誣蔑。本文為他澄清，本文也基於《國語》的記載，澄清衛文公不禮晉公子重耳的一段公案。最後，本文檢討了衛成公由於一著之差，而幾乎又失國，日後還不得不再東遷至帝丘。

關鍵字：清華簡 左傳 繫年 衛文公 衛成公 公子啟方

*美國密西根大學物理學博士。前臺灣·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兼教務長

A Bumpy Road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hrone: Reexamining the Lost Historical Anecdotes of the State of We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Tso Chuan and Tsinghua Bamboo Slips—Xinian

Li Yi Yan

Abstract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Xinian is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that may have been compiled by the State of Chu.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Wey in its fourth chapter, with emphasis on the state's near subjugation to the Red Di trib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hrone by Wen of Wey in the town of Cao during which the capital was moved east to Chuqiu, and then farther east to Diqiu during the reign of Duke Cheng of Wey. If compared with Zuo Zhuan, Xinian is overly simplified and contains some inaccuracies, particularly the mistaken identification of Duke Wen of Wey as "Gonzi Qifang." This error offers a clue for the present study to advance the hypothesis that Gonzi Qifang was actually the "Qizi" mentioned in the chapter "Duke Min of Lu—Year 2" in Zuo Zhuan. He was a younger brother of Duke Wen of Wey, after whose ascension moved to the State of Qi and became a Great Officer in the court of Duke Huan of Qi. This character was further maligned by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r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seeks to clear his name and to clarify the incident of Duke Wen of Wey's alleged discourteous treatment of Gonzi Chong'er of the State of Jin, as recorded in Guoyu. Fin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count of Wey's nearly repeated subjugation resulting from Duke Cheng of Wey's miscalculations, and the consequent shifting of the capital eastward to Diqiu.

Key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Tso Chuan, Chronicles, Wei Wen Gong, Wei Cheng Gong, Gonzi Qifang

一、導言

《清華簡·繫年》的釋文出版後，增加了我們對春秋（以及戰國初期）歷史的瞭解。就《繫年》的本身看來，只不過是一些簡短的歷史事實（以及傳聞）的堆砌。雖然不似魯春秋之斷爛，可是已經簡短到只剩骨架，也剝脫掉對話以及史評。若與《左傳》相比較，可以發覺它所記述的事項基本可靠，可是也免不了有不少誤記以及粗心的錯失。記事的範圍，以楚晉間的爭霸為主，以齊與秦為陪襯。至於其他諸侯，以及較遙遠的周初事跡，只不過點到為止。雖然如此，我們反而可以由它的過失，增強對春秋史的判斷。後面我們將選擇衛國的歷史為例。

近來有一篇論文討論《繫年》的這些特點（Yuri Pines 2014: “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troducing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 *T’oung Pao*, 100(4-5):287-324）。它也推測這部書的編纂目標，是為了讓楚國的對外使節（行人）有一些基本的歷史知識背景。Pines 先生的推想固然相當有說服力，我卻認為還有其他可能性。

《繫年》編纂的時間大致在戰國前期，當時楚國的國力已相當膨脹，現在湖北與河南地區的許多小國，都被滅亡。除了小部份分封自己的貴族，大部份設縣來管理。那些中層的管理人員，都需要從頭訓練，而當時的農耕技術與工商業進步得非常快，管理人員需要學習的知識也遠比以前多。除了專門人才外，一般人不可能花費太多時間在歷史掌故上。因此需要將歷史濃縮作為教材，在空間上著重於與楚關係較密切的晉秦齊等國，在時間上較詳於春秋中期以後。不在這個範圍的材料，就大幅被犧牲掉。

我相信《繫年》就是在這種要求下，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從春秋後期開始，教育事業就逐漸由貴族移至民間。我猜想《繫年》的編者，可能是楚國的低層貴族，但其教育對象，則包含民間的俊秀。他掌握一批官方資料（尤其是春秋後期的），可是他不受官方控管，時常有粗忽的地方。有些錯誤是很難說得通的，例如第十五章：「王命申公屈巫適秦求師，得師以來。」我只能假設編者對楚莊王時期的歷史細節，太缺乏判斷能力。

二、《繫年》對衛國歷史的記載

《繫年》的第四章，致力於介紹衛國的歷史。除了起首一段，談到康叔封由康移國至衛的原由外，後面就談到衛文公的避狄與復國，引述如下：

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卩]王[中卯]唬起師伐衛，大敗衛師於甯，幽侯滅焉。翟遂居衛，衛人乃東涉河，遷于曹焉，立惠公申；公子啟方奔齊。[戡一自]公卒，齊桓公

會諸侯以城楚丘，□公子啟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翟人或涉河，伐衛于楚丘，衛人自楚丘遷于帝丘。

有幾個在括號中的字必須澄清。為了避免造新字，這是不得已的。「翟卩」是左翟右卩(邑)、「[中卯]」是上中下卯、後面的「唬」字其實是上虎下口、「[戠一自]」是上戠中一下自。「□」是竹簡上的缺損，我猜是「立」字。

為比較起見，謹將《左傳》中的對應記載（除成公遷于帝丘那一部份，那是三十年後的事，見後）

（《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之二）年，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左傳》這裡記載了自 660BC 至 635BC 間凡 26 年的史跡，頗有一些細節。《繫年》之記載雖簡，但也顯露出一些問題，值得研究。

首先是「懿公」與「戴公」兩個謚號的問題。這在《左傳》已記載得很清楚，可是《魯春秋》卻完全沒有寫。事實上，《魯春秋》只有「狄入衛」三個字。原來《魯春秋》對謚號的承認，只透過對先君的葬禮，而書寫「葬某某公」（例如僖公二十五年先書「夏，衛侯燬卒」再書：「秋，葬衛文公」）。未葬以前，對故君只稱名，而且在沒有稱「即位」之前，對新君降稱為「子」。

現在我們很容易把這些呆板的玩意，當成周室封建，或是孔子「正名」的「文字遊戲」。可是現在我們發現，未經正式赴告的名份，在傳聞上，的確會產生若干差異。例如戴公申立後不久去世，沒有正式即位。《左傳》的事後追記只說「立戴公以廬于曹」，《繫年》也只記「立惠公申」。這裡用的「惠」字，就是現在的「德」字，可是後面記載他的去世，卻寫「[戠一自]公卒」，這裡的「[戠一自]」字，很可能就是「職」字。

我仔細看過竹簡的放大圖，《繫年》的確用了兩個不同的字，作為衛君申的謚號。〈釋文〉引用了音韻上的因素作為解釋，可是我相信「戴公」的稱號，是日後才定下來的，當時兵荒馬亂，根本沒有時間發正式文告。大家只感念他在危急中，肯出來支撐大局，有人認為他有德，有人認為他盡職。傳到遼遠的楚國後，《繫年》的編者就不知如何取捨，而兩存之。當然，追謚為「戴公」後，一定會在楚國的政府文件留下記錄。可是《繫年》的編者，卻沒有興趣追查，這也許是比較合理的推想。

再來談滅於狄的那個亡國之君，《左傳》稱他為衛懿公。可是《繫年》的記述，卻是「幽侯滅焉」。似乎他謚號是「幽侯」，這不是個好謚。事實上，在《論衡·儒增》還看到。另一謚號「衛哀公」，同一篇還引述「弘演納肝」的故事。這些都是與《左傳》違異的。

現在回到《左傳》所述的現場，衛侯是率領了一小隊軍人（包括少數戰車）與狄人戰死的。由於兵力懸殊，衛師大潰，而且沒有多少人能夠逃脫。狄軍隨即入城（可能繼而屠城），留守的衛臣與百姓紛紛逃亡。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會有人去戰場收屍。《論衡》引述「哀公」屍體被食的故事，固然不大可能，而暴骨沙場則是無可避免的。故定謚號的事，一定在繼起的政權稍微穩定之後才會實行。

我推測「衛哀公」的謚號，是戴公在漕邑時賦與的，以與現實相符。文公在楚丘休養生息後，一定想起故君雖然不得民心，然究意有殉國的英勇事蹟。尤其在赴死前從容安排守城之事，又贈夫人繡衣作為留念，这一幕必定感人心弦。他在位僅九年，可能還很年輕，也沒有兒子（否則會交待臣下保護出險）。民眾原本因為他好鶴而產生的反感，到後來逐漸被遺忘。而他的英勇事蹟則被加強流傳，以增強敵愾之意，因此改了「懿公」的善謚。據〈謚法解〉：「溫柔賢善曰懿」，這也許就是文公朝眾人的想法。

至於《繫年》的「幽侯」，並未晉爵至「公」，不可能是正式的謚號。也許是《繫年》的編者，採自早期的傳聞（因而反映了流離百姓對他的憎恨），尚無暇向楚國官方紀錄查考（因為衛國對先君謚號的變更，一定會赴告到楚國），這是他粗疏的地方。

《繫年》這一章還有些資訊值得注意。《左傳》只說「狄入衛」，而《繫年》則講明是「赤翟」，與《竹書紀年》合。它甚至給出「赤翟」國王的名字「[中卯]咺」，是別的史料所無。無可比較，姑置之。

可是《左傳》與《國語》往往只稱「狄」，而戰國與以後的史書，往往雜稱「翟」與「狄」，似乎這兩個字可以通假。可是從二字的文義看來，又無可通假之處。尤其是《繫年》的「翟」字，還加上「邑」字邊，成「[翟邑]」，似乎他們已學華夏諸國定居，並建了城邑。

我推測「狄」字，本是華夏人對這些部落的稱呼，本取遼遠之意。這些遠方族人進入華夏定居，必不樂意被稱為「狄」，而另以取義「羽飾」的「翟」作國名，甚至加上「邑」字邊旁。狄族的不同部落分別建國，與華夏打交道，其較重要的有「赤狄」、「白狄」與「長狄」。在春秋初期，活動於今山西與河南間的「赤狄」較強盛。攻滅衛國，以及日後晉文公

所寄居的「狄」，就是赤狄，那時儼然成為一個強國，與華夏各諸侯有外交關係，有時甚至通婚。

春秋時女子稱姓，此國的女子就以「隗」為姓（例如晉文公在狄所娶的季隗。此字不知是否由「鬼方」的名稱而來？）。由於《繫年》的「翟」加「邑」字邊，我認為此時的「狄患」，已與西周時的遊牧民族不同，應比照諸侯國來看待。

三、宣姜諸子女對衛國復興的貢獻

《繫年》的記載與傳世之史書，最大的差異在下面這段：「公子啟方奔齊…城楚丘居公子啟方焉，是文公」《繫年》認為，衛文公本來是「公子啟方」，可是《魯春秋》與《左傳》明載，衛文公名「燬」，見下面各條：

《左傳·僖公十八年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蒧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

《魯春秋經·僖公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公穀也有類似的記載。《繫年》以衛文公為公子啟方，似乎只是個單純的錯誤，沒有什麼好談的。真是這樣嗎？

讓我們回溯第二節所引《左傳·閔公二年》的一段：「…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顯然是屬於衛國的公族，他的兒子才能繼任衛君。幾乎所有後來的史書，都追隨《史記》將昭伯等同於黔牟與惠公朔爭國的人）的弟弟公子頑。昭伯與宣姜生了五個孩子，其中至少有四位，對抗拒衛國淪亡有貢獻。戴公與文公都繼位為衛君，而文公的貢獻為尤大。

至於二個女兒，宋桓夫人的丈夫是宋桓公御說，當狄軍攻入衛國的都城，百姓渡河逃亡時，宋桓公及時伸出援手，率兵保護難民在晚間渡河水（黃河），立足於漕邑，並幫助戴公成立臨時政府。不必說，宋桓公的夫人一定發揮了影響力。至於許穆夫人，由於許國的國力太弱，不能出兵助守，許穆夫人就自己出面，呼籲各大國出面支援，為此與許國的大夫有所爭執，她賦詩明志。《左傳》特別提她賦了〈載馳〉。現在該詩還見於《詩·鄘風》：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陟彼阿丘，言采其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可以看出她為祖國所盡的心力。五個孩子，似乎只有「齊子」沒有著落，那時他在哪裡呢？

首先要確定的，是「齊子」的性別，答案其實很明顯。如果「齊子」是女，《左傳》一定不會用「齊子」稱她。因為春秋時女子稱姓，稱「某子」的女子，只限於「子姓」（例如宋國）。「齊子」若為男子，則可解為：在齊國的那位先生，自然多了，所以昭伯與宣姜生的，是三男二女。

五個男女的排行如何，由《左傳》實在看不出來。《左傳》的引述，似乎沒有特定的次序。唯一可講的是，戴公的年齡一定比文公大。所以在立君的考慮上，先考慮戴公。如果沿著這條思路判斷，（如果不計入女兒的話）「齊子」應該是老三。

五個孩子的年齡差異不應該太大。因為當宣姜生他們的時候，應該已是高齡產婦，不會到很老還生孩子。我們可以先估計一下宣姜的年齡。

宣姜從齊國嫁到衛國，本來是作為太子急子的夫人，卻被急子的父親衛宣公強佔作為妻子。她與宣公生了兩個兒子，壽與朔，壽到魯桓公 18 年（702BC）時，已長大到能夠與急子爭相赴死。假定當年壽是 15 歲，則宣姜的生年，無論如何不會遲於 734BC，則 695 年宣姜改嫁昭伯時，宣姜已差不多 40 歲。到 660BC 狄入衛，宣姜如果還活著，應該已年高 75 歲。假如她改嫁後每年生一個孩子，則當狄入衛時，最小的孩子為 30 歲，當然這只是上限。如宣姜遲幾年生他們，他們就會年輕幾歲。

二十餘歲的青年，已經夠成熟赴國難了。可是衛文公是當年奔齊嗎？又不然，《左傳》明明記載：「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換言之，當狄入衛時，文公已在齊國，而不是事後奔齊。《繫年》的記載，就這點來說並不正確。

再看看狄入衛之前，衛國有多麼「多患」。可能衛懿公即位時太年輕，沒有受太好的教養，權抓在手後就胡作非為。衛國當時並非沒有老臣，尤其是懿公最後交待的石祁子與甯莊子（名速），竟連一點挽救的餘地也沒有麼？

這還得從惠公講起。惠公本靠著齊魯之助，攻入衛國，成功復位。復位後將國庫與宗廟的寶物，用來賄賂齊襄公與魯莊公。卻為了報仇，而殺了本來甚得民心的左公子洩與右公子職，並放逐了舊臣甯跪（好在他的孫子甯速後來被招回）。原來得周室支持的黔牟，逃回周室，惠公因此也怨了周室（人民也因此對他離心離德）。本來以為有魯齊可以倚靠，可是齊的助衛本是勉強，而且不久之後（魯莊公十一年）齊襄公被弑，經過一段短時期混亂後，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他不會對衛惠公有特別的感情，而魯莊公之出兵助衛朔，本為了自己在諸侯間立威。趕走黔牟，取走賄賂後，有他的事業要忙，也不會多管衛國的事。

齊桓公稱霸後，衛惠公雖勉強參預盟會，可是在國際中充尾巴，終是不爽。終於至魯莊公十九年（675BC，衛惠公復入後 13 年），周室有亂事。周惠王與王子頹爭權。王子頹失敗

後奔衛，衛惠公以為機不可失，聯絡了南燕出兵，趕走周惠王，送王子頹回周，可是周惠王很快得鄭厲公（突）之助復國（魯莊公 21 年），並殺了王子頹。

衛惠公本來以為可以在周室建立一個親自己的政權，結果押錯了寶，花費國庫的錢出兵，卻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自此之後，衛惠公在國際上更加孤立。至魯莊公 25 年（669BC 惠公復入後 19 年），衛惠公卒，傳位懿公，國際形勢毫無改善。反而周惠王忽然想起衛惠公納王子頹之恨，利用齊桓公「尊王」的招牌，派召伯廖命令齊桓公伐衛，以懲罰從前擁立王子頹的罪行。

齊桓公當然奉命唯謹，於魯莊公二十八年出兵伐衛，要他們為九年以前的愚行負責，剛即位三年的懿公，大概還不知道如何上戰場。臣下如何是齊桓公的對手？好在齊桓公只是奉王命申斥一番，年輕的懿公只好代表他父親認錯。可是齊桓公出兵的這筆帳還是要算在衛君頭上，需要賠償軍費。

《春秋·二十八年經》載：「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及秦人戰，衛人敗績。」《左傳》載：「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衛懿公吃了這個窩囊虧，當然心中不服氣，對老臣的勸諫也不大願意聽了（因為他要為前人的爛攤子負責），大概這時就染上了養鶴的癖好，以為對人無害。老臣雖然心知人民的反感，也很難釜底抽薪。

那時赤翟已經強大，魯莊公 32 年冬（衛懿公七年），狄伐邢，那時邢在今河北邢台市附近，位於衛國北方。次年齊桓公還出兵救邢，這些事對衛懿公都構不成警惕。當然，從一個旁觀的人眼中，衛國是夠「多患」的。衛文公即時大概已警覺到了赤翟向東侵略的野心，才離開父母赴齊，希望引起齊桓公的注意。他在齊桓公底下，大概有一段從政的時間。

那麼《繫年》所述的「公子啟方奔齊」，指的到底誰呢？我認為能照顧到最多方面的假設，就是將《左傳》的「齊子」與《繫年》的「公子啟方」等同起來。換言之，「公子啟方」是未來衛文公的弟弟。他急忙地到齊國（而不是「奔齊」！通常這個術語只用在失權的大夫或國君身上）找哥哥，報告衛國現況，順便向齊桓公求援。為了要支援這個設定，讓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當事人遭遇的情境。

昭伯與宣姜在惠公打回衛國之前，可能逃到成周附近隱居起來，本來決定專心教育子女，不再介入政治。可是到魯莊公 21 年，王子頹事件平定以後，昭伯與宣姜意味到惠公的倒行逆施，將對衛國造成禍害。他們一方面加強教育三個兒子，另一方面透過周室的關係，將兩個成長的女兒，嫁給諸侯國君（後來分別嫁到宋國與許國）。

到了魯莊公 32 年前後，三兄弟中的老二察覺到赤狄的危機而赴齊，老大與老三留侍雙親。到魯閔公二年，赤狄真的向衛國發動攻擊，那時昭伯與宣姜可能已去世（如果還沒有的話，也老得走不動了）。老大與老三毅然東行，剛好衛國被打破，難民紛紛逃到漕邑。那時兩兄弟一定與宋桓公連繫上，也趕到漕邑，幫助民眾安定下來。

我這樣假設，是因為《左傳》記載懿公赴死之前，從容對老臣與夫人囑咐，卻沒有提這

兩兄弟。唯一的可能，是這兩兄弟在城破時並不在城內，而是由外地趕至，那時老三一定是老大治國的助手。到老大因過勞病逝，老三一定會想起老二還在齊國。而且當時的情況，也非要有齊桓公的幫助不可，所以才匆忙趕到齊國，找到二哥，也見到齊桓公。他趕赴齊國那件事，流傳到遙遠的楚國，就變成：「公子啟方奔齊。」所以《繫年》的這個記載，也不能算完全錯。

《繫年》最大的錯誤，是將「公子啟方」當成後來的衛文公。當然我們可以原諒他，把兩兄弟的名字弄錯了。可是老二名「燬」，老三名「啟方」，真的這樣容易弄錯嗎？好在我們看到另一條資料，可以讓這個錯誤更合理。

漢初賈誼的《新書·審微》篇有一項記載如下：

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火為」，然後受之。

這裡需要解釋的，其一是：「周行」的「行」字，是「行人」的簡稱。其二是：「火為」與「燬」是異體字。漢初「今文」對「古文」的變異很大，到如今「火為」已經沒有人用了。不過由這段記載，我們知道衛文公初即位時的人名是「辟疆」，到政權穩定後朝周，才被逼改名。「辟」有開闢之義，「疆」有「疆土」之義，老三名「啟方」，「啟」也有開拓之義，「方」也有「方國」之義。二兄弟之名可以互訓，無怪乎楚人會搞錯。再注意一下，不但老二老三之名，顯示他們的志氣，就是老大名「申」，也有「伸展」之義。

再設身處地替老二想一想，為什麼他選擇「燬」作為新名字。他好不容易在楚丘把政局穩定下來，親自朝周，以求承認，卻被周的行人一頓官腔打回來。那時他一定想到《詩·周南·汝墳》第三章的句子：「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原詩的「王室如燬」，也許指驪山亂亡之事，可是「燬」字也有「烈火」之意。覺得周行人的官腔，對他有烈火般的壓力，雖然如此，成周附近究竟是父母舊居之地。可能在這種感觸的影響下（而且立即改名的要求也造成壓力），使他決定改名為「燬」，就是這個名字，才保存在《春秋》內。

當公子啟方在齊國找到二哥，兩人一起往見齊桓公請求支援。由於情況危急，齊桓公派公子無虧率兵到楚丘幫助衛君立國，並且大量供應築城材料，兄弟兩人一定對齊桓公非常感激。齊桓公如果提出，可以讓二哥到楚丘即衛君之位，可是卻要三弟留在齊國當大夫，三弟也沒有拒絕的餘地。就這樣，公子啟方留齊十餘年，為齊桓公之大夫，使《左傳》的作者稱他為「齊子」，而漏掉他的本名。可是不但在《繫年》中留下痕跡，戰國雜史中也多有記載，只是經過漢初的改寫，為避景帝之諱而記為「公子開方」，這就是今日我們看到的名字。

四、「公子開方」遭遇的歷史詛譎

《左傳》但稱公子啟方為「齊子」，而遺漏了他的名字，後面也沒有提他的事蹟，可是他在齊桓公底下做大夫，則是無可懷疑的事。設身處地替他想一想，他哥哥在楚丘的政權，要靠齊國的援助維持，所以盡心盡力為桓公服務，是他唯一可以報答桓公之路；而在管仲底下，也不可能特別出眾的餘地。所以他在桓公朝，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大夫，沒有特別吸引人的事蹟，好像留下一片空白。後來戰國諸子，正好看上這張白紙，以便將一些故事附會到他身上，以為他們的主張作例證。最初還不敢講得太離奇。我由《繫年·第四章》釋文的注釋第十三，注意到《管子·大匡》篇所引述的故事。

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

這裡管仲推薦三人，以維繫各諸侯國的關係。其事之有無，雖難以證實，然而的確合於管仲在推薦人之先，分析其人優缺點的作風。同樣的資訊，也出現在《管子·小匡》篇。

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怙，足恭而辭結，正荊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三使者而後退。

《管子·小匡》的大部份，與《國語·齊語》合。可是最後那一段，顯然另有出處。與《大匡》篇相比，對公子開方的推薦是一樣的。故知至少在戰國前期，「公子開方」的名譽還不太壞。可是到了《管子·小稱》就不同了：

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

下面的敘述非常不合情理，故只略引述其有關「公子開方」的部份。桓公先聽管仲的話逐四子，但反而更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結果桓公又復四子。到桓公臨死時，被四子困於一室，不得出，以至「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而「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其實桓公末年，五公子爭立之亂，完全載於《左傳·僖公十七年》，那才是值得引述的。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

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子皆求立。冬十月己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可知這場禍事的起因，完全是由於桓公立太子的前後反覆。既已立公子昭（孝公）為太子，並已宣告於諸侯。管仲死後，復因寵衛共姬而復許立公子無虧（即武孟）。本來很簡單的立儲之事，因桓公的反覆而變複雜。既私許立公子無虧，又沒有廢公子昭，以致其他四公子也心生微幸。亦結黨以爭立，其中衛共姬因勾結易牙與豎刁（即寺人貂），而得立公子無虧，於是引起諸侯的干涉。

《左傳》對事件的前因後果，連桓公卒日，赴日及殯日的細節，都詳為記載，可是並未提及公子開方。可見整件事與公子開方無關（衛戴公立時，齊公子無虧已率兵助守，可見衛共姬年齡已大，與衛文公一家無關）。可是戰國時的諸子，嫌事件本身太簡單，用作例證，對支援各該諸子的主張，缺乏說服力。因為公子開方的生平，就像一張白紙，容易渲染，因而造作了不少故事。

《管子·小稱》篇的故事，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差不多的故事，也見於《韓非子·難一》其實那些故事的細節，都經不起考驗。例如〈小稱〉篇說管仲批評公子開方事桓公十五年，不回衛探視父母。其實〈小稱〉篇的作者，沒有去查考同屬《管子》的〈大匡〉與〈小匡〉篇，在那裡管仲明明推薦公子開方游衛，而且已為桓公所接受。以《管子》證《管子》，可知〈小稱〉篇的作者完全胡說。

其實按照前面的考證，「公子啟方」赴齊告急時，其母宣姜即使還活著，亦已有 75 歲了，不可能再活多少年。〈小稱〉篇的作者既不知「公子開方」是宣姜的兒子，在造作故事時，就隨手訴諸儒家的孝道，認為不見「公子開方」提及其父母，是其人格缺點。才造作不歸省親為他的罪狀，而且將話硬賴在管仲身上，不自知已經露出漏洞了。

諸子造作的故事，目標只在宣揚他們的主張，影響還不太大，可是當這些故事被司馬遷吸收進《史記》，影響就大了。而且史遷還疏於考察，對「公子開方」的罪狀，再加深一層。《左傳》完全沒有談到公子開方的下落。替他設身處地，齊桓公既死，齊國大亂，所以報桓公者已盡，當然應該回衛幫助他哥哥。

在〈小稱〉篇造作的故事中，說「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也許是因為有此傳聞而加以附會。就齊孝公在位時，齊衛間多糾紛看來，他的確很難繼續在齊國存身。可是他既然離齊，就不會再有影響力。到十年後，齊孝公卒，《史記》說「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此事經傳全無記載，也不知史遷從何處得來。齊孝公十年是 633BC，當時衛文公已去世，公子

啟方如果還活著，至少也快 60 歲了。很難想像他在齊國還有勢力，可以被齊國的公子潘

所「因」而殺儲君。而且齊昭公卒，曾向魯國赴告，記錄在《魯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魯國當然也參加了弔唁之事。如果當時發生殺儲君之事而不記錄，是很難想像的。我寧可相信，史遷因一時失考而寫了這件事，不過這又替公子開方再增君一項罪狀。這些都是我們閱史時，應該善加判斷替他平反的。

五、衛文公在楚丘的治績

衛文公於魯僖公元年，至漕邑即衛侯之位，同時配合齊桓公的援助，在楚丘築城。僖公二年楚丘城築成，衛文公遷至楚丘，開始建國的努力，當時人口雖然不多，卻上下一心投入建設，《左傳》的評語是：「衛國忘亡！」

《左傳·閔公二年》的最後一段，描述作為領導者的政策與作風。《左傳》用簡短字眼點出他的政策：「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同時致力發展武力。以抵禦狄患。到他去世時，兵車數已增到三百乘，與牧野之戰時相仿。

民眾對衛文公的領導，當然赤誠擁護。有〈定之方中〉一詩為證。原詩具載於《詩經·鄘風》，不具引。此外，為了報答齊桓公的援助，衛文公也積極參加齊桓公所召集的諸侯盟會，有時也必須出兵助戰。按《左傳》之記載，計有：僖公四年伐蔡以及與楚之召陵之盟、僖公五年首止之盟、僖公六年伐鄭新城之役、僖公八年洮之盟、僖公九年葵丘之盟（這是孟子最艷羨的盟會）、僖公十三年鹹之會助抗於淮夷、僖公十五年牡丘之盟以及匡之役以救徐、僖公十六年淮之會以謀鄭（此役由於次年齊之內亂而不果成）。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衛文公對齊桓公的支持態度。當然，齊也協助衛文公進一步鞏固城防，僖公十二年諸侯助衛建築楚丘的外郭，因為墮狄始終在那裡虎視眈眈下一年春果然來犯。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衛文公也表達同情心而予以接納。

魯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去世之前，歷史對衛文公的評判多是正面的。可是有一宗公案，需要在此澄清。《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追記晉公子重耳離狄的長途旅程，一開始就記載：「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很多人看了這一段，以為衛文公當時看不起晉公子重耳，逼他去向野人乞食，重耳於僖公十六年離狄赴齊，那時衛國內還算平靖。既然六年前可以接納來奔的溫子，這時實在不應該不招待重耳與他的隨從。更何況該年十二月，衛文公與齊桓公有淮之會，如對重耳有不禮之舉，在會中如何向齊桓公交待？所以這一段記載是有問題的。如果查對《國語·晉語四》，可以發現致誤的原因。引在下面：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

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 …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叛齊…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

仔細比較《左傳》的追記與《國語·晉語四》，可以發現這段追記的主體，完全是從《國語》來的。只是要將《國語》一大段，濃縮成僖公二十三年的一段追記，不得不省卻許多細節，有時顯得不連貫。

我相信《左傳》作者在採取《國語》此段時，將「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放在離齊以後（那本是《國語》對應段落的濃縮），因為省略掉甯莊子一大段諫言，而顯得不連貫。傳《左傳》者遂將之移前。其實我們設身處地想一下，按照狐偃的計劃，由於管仲在前一年已死，齊桓公身邊無人，重耳必需趕快赴齊，博取齊桓公的好感，建立自己的影響力。

既然想儘快到齊國，當然要採取較短的路線。所以不可能彎向南，渡河至楚丘，那時河水之北本是衛之故地，卻被狄人長期騷擾而空曠。最短的路線，是在夷儀西邊一帶渡河（當時的河水流域與現今不同）。所經過的「五鹿」，據清顧棟高的考證，在今河北省大名縣附近。《國語》記「乞食於野人」，完全是突現重耳受天佑賜予土地，當然不會由於絕糧（否則一行如何赴齊？）。因此重耳當僖公十六年時，並未經過楚丘。說他過衛，只是勉強將五鹿當作衛的故地而已。

我這個結論，雖然與楊伯峻的《春秋左傳註》相違，可是反復考慮後，還是認為《國語》的講法正確。至於重耳於僖公十八年離齊過衛的事，則在下面處理。

齊桓公去世後，衛文公的建國之路變得更加坎坷。赤狄之患始終存在，雖挫於齊桓公，然而卻變得更狡猾，學足華夏諸侯之間「拉一國打一國」的手段。齊本立公子昭為太子，得諸侯的承認。因此當宋襄公出兵納公子昭時，衛文公必須參預。然而奇怪的是，魯與狄卻站在公子無虧那邊，號稱「救齊」。魯僖公不久知難而退，狄卻借「救齊」的名目，與在夷儀的邢國勾搭上了。

邢與衛本來都被狄攻破，都蒙齊桓公之助遷國。此時邢可能妒羨衛的建設成果，居然忘仇而與狄結盟，反過來去攻打衛國，圍苑圃。那時邢人狄人兵臨城下，而衛文公十數年來的努力，多本文治，以培養國力。初遇大敵而軍未擴，不免亂了手腳。正當此時，晉公子重耳從齊亂中逃出，希望在衛歇足。招待重耳一行人本來花費不多，可是邢人狄人隨時會打來。衛作為東道主，必須負起保護之責，而甯莊子（速）的諫言又十分有理。衛文公被逼，召集大眾與群臣問計，自願退位。見《左傳·僖公十八年》的這段記載：「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眾不可，而復師于訾婁。」這是非常不尋常的。國君既然說到如此地步，大家知道不犧牲不行，才傾國力建軍。《左傳·閔公二年》所述：「季年，乃三百乘」，恐怕就是這次建軍的結果。而晉公子重耳一行人見到局勢如此，也就折向南，離衛赴曹。

經過此役後，衛與邢遂結不解之仇。到次年，雖然天大旱，還是勉力出動新建的軍隊伐邢，好在師出有功。不久，旱象解除，衛才有充份的餘力，憑自己的力量來抵禦外侮。

可是當時的國際局勢卻繼續惡化。宋襄公雖志在求霸，卻沒有足夠的才能，行事不能服諸侯。齊孝公雖得襄公之力入齊即位，卻不願受宋控制。魯僖公二十年，齊遂加入邢與狄的一方以謀衛，並於次年侵衛，衛文公傾國力以抵抗。那時自顧不暇，對宋、齊、楚之間的衝突只好視而不見。僅就近打南方的主意，並與鄭人爭滑、赤狄當時忙於介入周室的朝政，一時顧不到邢國。

衛文公那時已病重將死，為謀一勞永逸，還是出兵攻邢。僖公二十五年，衛用禮至之計，用突擊的方式殺了邢城的國子，居然一舉滅邢。這一役，衛勝得實在傲倖，而且還被《左傳》批評為「滅同姓之國」。不過解決了邢這個心腹之患，究竟是聊勝於無。衛文公隨即去世，將未完成的建設大業，留給兒子衛成公（鄭）。

六、衛成公的困局

衛成公即位時，春秋的國局勢還一片混亂。齊與宋已失霸，最有可能出頭的，是南邊的楚與西方的秦。晉文公是一股新興的力量，剛回國不久，已經穩定了政權，出兵勤王，替周襄王平了大叔帶之亂。然而晉文公的興起，剛好擋住了秦穆公東出之路。秦晉關係雖然良好，總不可能一直不衝突。因此這兩股力量，有互為抵銷之勢。

另一方面，楚成王的北上沒有受到阻擋，衛成公於是決定走親楚的路線，與楚結為姻親。另一方面，他也與魯僖公結成盟友，約定有事互為支援。這時衛已有一小股武力可以用，不像文公初年時的可憐相。

可是楚成王的勢力，向北擴張到鄭、曹、衛等國，將宋逼到非親晉不可。至於齊孝公，雖然已經失霸，卻不甘仰人鼻息，也在小範圍內造成糾紛，促成了衛齊之間的局部戰事。

情勢的急轉直下，是由於秦與齊察覺到楚的野心，與晉結成抗楚同盟。因此晉楚間的戰爭一觸即發，而處在中間的宋與衛，就淪為兩大勢力間的芻狗。宋既然受到楚的攻擊而向晉告急，晉就攻曹衛以分楚的兵力。這時衛成公身不由己，命運要看晉楚哪一方勝利而定。衛與魯雖有同盟關係，可是魯國公子買微弱的戍兵，同樣救不了衛國。晉楚間的決戰，終於在楚丘東邊不太遠的城濮展開。由於楚方統帥令尹子玉（成得臣）的戰略錯誤而失敗，連累到追隨楚的尾巴國家也跟著倒霉。魯僖公二十八年，衛成公被逼離衛到楚國避難，將投降受盟之事，委託給弟弟叔武與大臣元咺。這個決定，結果又是一場悲劇。

原來這時的衛國臣民，已經不像文公時那樣團結了。當衛成公決定親楚，本來就是一場政治賭博，既然失敗了，就應該不怕親身面對。可是當晉人要來佔領時，他一時的膽怯（怕被俘），使他暫時將政權交給弟弟與給大臣元咺手中。這會引起其他臣民的妒忌，也不能避免有讒言。有人進讒，說元咺已經擁立叔武了，這使他殺了元咺的兒子元角。

到後來晉人准許成公復歸時，讒人又怕二兄弟之間的談話，會不利於他們，結果射死了叔武。兇手公子歆犬當然也不免被殺，結果真的將元咺逼急了，向晉文公投訴。這次真的輪到成公自己被捕被辱，完全仰賴甯俞的保護才能活命。而晉支持元咺回衛，另立公子瑕，成公當然不甘，又引起一場政變。最初為了避免被俘，到後來不但避不了，還犧牲了元咺父子、弟弟叔武、公子歆犬、士榮、公子瑕，以及其他次要人物。這些都是衛國的精英，因成公一念之差而葬送了，最後勉強保住了衛侯之位。而多年努力所攻取的土地，有不少也被其他諸侯分割掉。經過這次事變，衛國的國力大傷。

衛成公是魯僖公三十年（或他自己即位後第五年）秋天還衛的。復歸以後才發現，剩不下多少武力可以用，而宿敵赤狄正在河水那邊，注視著隨時準備來犯。而他自己已成國際間的棄兒，找不到盟友幫助。他只有一年的時間，來凝聚國力（還好忠心的甯俞還沒遺棄他）。至魯僖公三十一年（629BC），狄果然渡河入侵。雖然抵抗住了，可是楚丘顯然還離河水太近，所以他又向東遷都到帝丘。《繫年》記錄了這件事：「成公即位，翟人或涉河，伐衛于楚丘。衛人自楚丘遷于帝丘。」單看這一段，而不從《左傳》、《國語》去查看前因後果，會以為文公在楚丘的建設功夫白做了。其實《繫年》省略掉很重要的一部份，那就是楚本來希望在衛建立影響力，卻失敗了。可能提到中間的過程，會令楚人太失面子，就乾脆省略掉了。

好在此後衛成公力圖改正以前的錯誤，在諸侯間恢復好的形象。他趁赤狄內亂而伐狄，並達成和平的盟誓（此後赤狄也漸衰）。與晉雖有衝突，因應付得當而化解。日後終於贏得晉的好感，而歸還之前被奪的土地。他去世於魯宣公九年（600BC），在位 35 年。

七、結語

因為《繫年·第四章》的記載太濃縮簡略，並有錯誤與誤導之處，引使我去查閱原始資料，爬梳出一些前人未注意之處。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由衛人努力復國的事蹟，可以看出衛國民眾在困難中，往往肯吃苦奮鬥。可是在受到政府弊政侵凌時，又敢於反抗，並且將心聲疾呼地表達出來。這種「敢愛敢恨」的習性，其實在他們的〈國風〉中就明顯表達出來，謹引三篇以見一斑。

《詩經·邶風·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詩經·鄘風·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見，

鵠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詩經·鄘風·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最後一篇已成為咒咀了。

衛人的習性也重情感，容易服膺於一些抽象的原則，連孔子也稱贊：「衛多君子」。可是也容易感情衝動而做錯事。

受到人民習性的影響，一些國君的行事也相類似。衛宣公可以奪媳，急子與壽可以爭死，公子朔可以努力復國，衛懿公可以好鶴亡國，衛文公可以奮發興國，衛成公可以逃辱反被辱，…都是這種習性的表現。日後衛君還會犯大錯誤，可是衛君也會努力行善。

這些極端的習性，使衛國始終存在於夾縫中。衛成公遷帝丘（濮陽）時曾經卜年，曰三百年。當時為 629BC，到 241BC 濮陽為秦所奪，衛在帝丘計 388 年。卜者也算準確。可是 241BC 衛元君逃至野王，仍稱君，又苟延了 32 年。到秦二世元年 209BC，忽然想起在野王的衛君甬（衛元君之子）還在，才將他廢為庶人。衛在諸侯中，除秦之外，算起來是最後亡的。

附記：本文為清華大學賴建誠教授代為打字，特此銘謝。

參考書目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09月01日。

《左傳》（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09月01日。

《管子》，台北：三民書局，1995。

《史記》（中華書局校點本），漢·司馬遷，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版）。

《國語》，韋昭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李學勤主編，上海，中西書局，2011。

《科學與歷史·「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一論衛宣姜的無奈和她的自訟》，李怡嚴，臺北：三民書局，2015。

Yuri Pines 2014: "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troducing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T'oung Pao*, 100(4-5):287-324.